

主編 吳洪澤 尹波
主審 李文澤 刁忠民

宋人年譜叢刊

八

四川大學出版社

主編 吳洪澤 尹波
主審 李文澤 刁忠民

宋人年譜叢刊

第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目錄（第八冊）

劉勉之事蹟考（郭齊）	四八六一
張九成年譜（尹波）	四八八七
延平李先生年譜（清·毛念恃）	四九三三
陳康伯年譜（羅國威）	四九四三
潘舍人年譜（明·宋濂）	四九七七
簡惠公年譜（清·周湛霖）	四九八五
屏山先生年譜（近·詹繼良）	五〇〇三
宋長興施氏父子事蹟考（近·陳乃乾）	五〇〇九
忠文王紀事實錄（宋·謝起巖）	五〇六五
梅溪王忠文公年譜（清·徐炯文）	五一九三
王十朋詩文繫年（李文澤）	五二〇一
李燾父子年譜（王德毅）	五二三一

洪文惠公年譜（清·錢大昕）
洪文安公年譜（清·洪汝奎）

.....五四五九
.....五五〇一

劉勉之事蹟考

郭 齊 編

據《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輯增訂

劉勉之（一〇九一—一一四九），字致中，號白水先生，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里白水人。踰冠以鄉舉入太學，師事程頤弟子譙定。盡得其學，遂棄科舉，歸結草堂，力耕苦讀。嘗請益於劉安世、楊時，又與胡寅、劉子翬爲友，相與講論切磋。紹興間，以呂本中等薦特詔至臨安，秦檜阻其見高宗，遂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多慕名而至。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劉勉之是高宗朝著名隱士，雖懷才不用，但聲名遠播。與朱松爲友，爲朱熹岳父、導師。著《草堂文集》，不傳。事蹟見朱熹《聘士劉公先生墓表》（《朱文公文集》卷九〇）、《宋史》卷四五九《隱逸傳下》。

本譜爲郭齊編，以《墓表》所載劉勉之事蹟較簡略，於是博採群書，鉤稽排比，對其家世、行歷、交遊及著述與學術成就等均有考述。雖不以年譜名，但按年繫事，仍屬年譜。今據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輯增訂改編，收入本書。

劉勉之是高宗朝著名的隱士之一，他雖然沒有做過官，但名氣卻很大。朱熹稱「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卓然杰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名立于不朽」。見朱熹文集卷九〇《聘士劉公先生墓表》（以下簡稱《墓表》）、卷九一《劉十九府君墓誌銘》（以下簡稱《墓銘》）。高宗曾特詔其入闕，準備重用，宰相趙鼎也親顧茅廬，專門前去拜訪。作爲朱熹的岳父，他也是朱熹學儒的啓蒙老師之一，對朱熹早期學術和思想發生過重要影響。劉克莊說：「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于天，然逆其淵源所自，……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西山文集》卷二六《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宋史·劉

勉之傳》也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然而迄今爲止，我們對劉勉之其人知之不多。各家所載勉之事蹟，均不出《墓表》。而《墓表》乃劉勉之死後五十年寫成，全文僅一千餘字，若干事蹟語焉不詳。對這樣一位既是朱熹岳父，又是朱熹導師的重要人物，我們理應有更多的了解。

閩中之劉氏，肇始于唐末。據熊禾《麻沙劉氏族譜》（《勿軒集》卷三）載，唐末鎮國上將軍、光州大都督、工部尚書、沛國忠簡公劉楚之子劉翺、劉翔于僖宗時入閩，翔居崇安五夫里，是爲東族；翺居建陽麻沙，是爲西族。然萬曆《建陽縣志》卷六載：劉翺「昭宗季年與弟金吾將軍翔、將作監簿翺入閩，翔卜居

崇安五夫里，號東族；翱居建陽麻沙，幽居建陽馬鋪，號西族」，與熊禾所稱「入閩者二人」不同。細考熊禾原文，劉楚「生六子，入閩者二人，曰少府監翱、將作簿、金吾上將軍翔。金吾生三子，……居崇安之五夫，……是爲東派祖也。將作簿者，其子爲兵部尙書，居于劉原。少府監開國公，……生子四人，……是爲西派祖也。」入閩者實也應爲三人，即少府監劉翱、將作簿某、金吾上將軍劉翔。只是官將作簿者失其名，「三人」誤作「二人」。《建陽縣志》所載劉幽爲將作監簿，與熊禾族譜正合。此蓋取自家譜，或可據信，今從之。同書卷六又載：「勉之，字致中，幽九世孫。」是劉勉之當出自西族。

曾祖父劉滋，生于宋初，年四十餘，以文

學起家于農畝之中，登景德二年進士。調知無錫縣，通判福州。仁宗天聖時，知南劍州，興修水利，州人德之。歷典九郡，更中外十四任，官終尙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墓表》、《青箱雜記》卷三、《八閩通志》卷六四、《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六）。劉滋生三子：劉同，仕至大理寺丞；劉勳，知臨江軍；劉照，即勉之祖父，歷仕朝請郎、河陽令。爲官不得志，未滿七十，即致仕歸，以高壽卒（《墓表》，康熙《福建通志》卷四七）。

父親劉元振，字君式，《墓表》不載其事蹟。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八稱元振「弱冠游太學，……國子先生呂大臨、游酢皆與之友善。……元豐中，士子方尙文華，元振獨沉涵載籍，深造義理。」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六、《東都事略》卷八九、《皇宋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六及《游酢年譜》等，呂大臨任太學博士在元祐元年、二年之間，游酢任太學錄在元豐八年。據此，元振入太學當在元豐末無疑。此時年及「弱冠」，進而可知元振生于仁宗嘉祐末或英宗治平間。元振少時沉靜有器識，季父劉勳當任子，準備讓他補官，他卻讓給了他的弟弟劉貺。在太學時，「持身有禮，衆敬憚之」。由于不願與俗沉浮，遂「不合于有司」而歸。他對父母親說：「兒爲志養，不爲祿養矣。」從此無意于科舉，縱情山水之間，終其一生（參乾隆《福建通志》卷五〇）。關於劉元振的卒年，諸書不載。《墓銘》稱：「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八

云：「卒于家，友人翁彥深銘其墓。」按《斐然集》卷二六《翁公神道碑》，翁彥深，字養源，世居崇安之白水村。累官太常少卿，建炎二年罷歸，家居奉祠，紹興十一年卒。據此，則僅知劉元振卒于紹興十一年以前。但劉勉之與其兄紹興初年遷居建陽（詳見下考），各家記載都沒有提到劉氏兄弟奉親前往的事，或元振紹興初已卒。

母親余氏，建州人，能讀書史，有文化（《墓銘》）。

從以上這些關於劉勉之家世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劉勉之的曾祖父劉滋，尚可稱顯赫。《拙齋文集》卷一九《祭劉丈先生文》盛贊「堂堂開府，德高七閩。」祖父一輩，則沒有人做過大官。而到了劉勉之的父親劉元振，只是一個沒有出身的

布衣了。家庭經濟情況也日見拮据，《墓銘》：「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劉勉之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道中落的士族家庭。

哲宗元祐六年

劉勉之生於建州崇安縣白水村。

關於劉勉之青少年時代的情況，已無從考知，我們只能從一些零星的記述中，得到一星半點的了解。《墓表》稱劉勉之「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闕闕，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可知勉之小時候十分穎悟，博聞強記，擅長作文，蓋習舉子業也。劉子翬《屏山集》卷一二《雲際會劉致中》云「少年鼻哂輕流俗」，這是對自己和劉勉之兒時年少氣盛，目空一切的精神狀況的回憶；《劉

致中惠瓜》：「因思少年時，窺園步清樾。百金酬地主，熟蒂香可揭。鄙懷須一快，聊效野人齧。」則描繪了他們偷偷溜進瓜園，在地頭大吃的有趣情景。

政和初，劉勉之二十餘歲。

時三舍法行于天下，《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載，崇寧三年，「詔天下舉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并罷。」自此，通過太學入選基本上成了入仕的唯一途徑。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宣和三年。劉勉之也在這時由建州州學貢入太學學習。在太學期間，他不顧當時「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的禁令，私下訪求河南程氏之書，潛心鑽研。同時，他又向當時在京師的程頤弟子譙定請教，更多地了解了二程的學說。

不久，他離開了太學。在還家途中，劉勉

之先後拜訪了名儒劉安世、楊時，他們的教誨，給予青年劉勉之以深刻影響。

大約在政和末、宣和初，劉勉之回到了崇安。這次太學之行，奠定了劉勉之思想、學術的基礎，此後一生出處繫焉。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考證。

關於太學之行的時間。《墓表》：「逾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大觀四年劉勉之二十歲，既稱「逾冠」，則其入太學不得早于政和元年。又言「時蔡京用事」，據《東都事略》卷一〇一《蔡京傳》、《宋宰輔編年錄》卷二二及《宋史》卷四七二本傳等，蔡京于政和二年五月自杭州召還，任太師右僕射，直至宣和二年六月致仕，又可進一步確定勉之入太學當在政和二年五月以後。那麼劉勉之是何時離開太學的呢？我們認為至遲

在政和八年。胡寅《斐然集》卷二七《祭劉致中》稱「膠庠之舊，磨琢之誠」，係指他和劉勉之是太學同學，曾一起切磋學業。同書卷一九《上蔡論語解後序》云：「某年二十一，當政和戊戌，在太學」，知胡寅政和末在太學，時劉勉之和他在了一起。又考同書卷一七《寄劉致中書》言：「致中兄，一別二十年」，此書作于紹興六年，由此上推二十年，正為政和七年。又按朱熹文集卷九〇《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先生少負奇才，未冠游太學。」劉子翬宣和二年及二十，稱「未冠」，則其入太學至遲在宣和元年。而迄今為止，沒有見到任何關於劉勉之與劉子翬同游太學的記載，唯一的解釋，就是劉子翬入太學以前，即宣和元年以前，劉勉之已離開太學了。又胡憲《祭

劉子翬文》（宋劉學裘《劉氏傳忠錄》卷三）說：「建炎戊申，公由上都間關來歸，始獲見于里中。」據朱熹文集卷九七《籍溪先生胡公行狀》，胡憲「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胡憲既和劉勉之同在太學，如果當時劉子翬也已入太學（子翬與勉之少年時即已熟識），就不會直到建炎二年才「始獲見于里中」。由此可確知劉勉之與劉子翬在太學實未謀面，即至遲在政和八年，已離開京師了。

關於私習伊洛之學。《墓表》記述道：「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表，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

之。」蔡京禁元祐學時間較長，《道命錄》卷二「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條下注：「至是（崇寧二年），頒學制于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前面說過，勉之的父親劉元振曾經與呂大臨、游酢友善。而呂、游均為「程門四先生」之一，元振受其影響，對二程的學說當有相當的了解。勉之受學于家，耳濡目染，後置嚴詔于不顧，陰習伊洛之學，其淵源也有所自。

關於師事譙定。《墓表》：「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譙定，字天授，涪陵（今四川涪陵）人，《宋史》有傳。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五〇、《宋史》卷三七八

《胡舜陟傳》等載，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涪陵譙定受《易》于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其後黨禍作，頤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爲首。」譙定從學程頤，精通《易》學，殆不爲虛傳。其首見程頤于洛之伊闕山在紹聖間，二見程頤于涪陵，在紹聖、元符頤遭貶時。程頤建中靖國元年始返洛（據朱熹《伊川先生年譜》），譙定親送以歸。《獨醒雜志》卷七：「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伊川得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史家或以定爲程門私淑，或直接將其列爲程門弟子，其學實有淵源。大觀元年程頤死後，譙定又到了京師，開始講學授徒。直到建

炎元年，定還在汴京。關於劉勉之與胡憲一起從學于譙定，今天已無從得知其詳情。唯宋劉應李所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辛集卷二載有譙定《答胡籍溪論易》一書，尚可窺一斑，茲錄于後：「某老朽無用，常欲緘口例俗，迂疏之學得遂棄置，私心所尙。然以吾友聽過情之問，奮古學之志，曠心無擇，主善而適，當風之竅，雖冀泯聲，不可得也。示喻見乃謂之象，若如是言，推爲文辭則可，于見處則未必。公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邪？語直傷紋，惟冀亮察。」

關於問學于劉安世、楊時。《墓表》：「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毗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

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謚忠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史》有傳。安世師承司馬光，爲一代名臣、名儒。黃震《古今記要》卷一九稱士大夫「過南京必見劉待制」。其著述今存《盡言集》、《劉先生譚錄》、《劉先生道護錄》，其門人馬永卿又輯其講學之語，爲《元城先生語錄》三卷。據馬永卿《元城先生語錄序》、宋黃去疾《龜山先生年譜》，劉安世大觀四年尚在謫籍，居亳州永城。尋叙復，于是年末、政和元年初卜居南都，遂不復出，宣和七年卒。劉勉之訪元城，當在政和末。關於問學的內容，稍見記載。朱熹文集卷八一《跋劉元城言行錄》：「熹之外舅聘君少嘗見

公睢陽，間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可知元城所傳，大致不出《元城先生語錄》的範圍。又《墨莊漫錄》卷四載：「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應。乃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于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

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勉中」當爲「勉之」之誤）此也足見談及的話題十分廣泛。這次問學，劉勉之受到的影響是很深的。《墓表》說：「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林之奇《祭劉丈先生文》言：「始學于譙，已得其真。繼師于劉，所養益淳。」胡寅《祭劉致中》云：「嗟嗟致中，早自貴珍。見賢必事，遇仁必親。學無定師，參以訂證。濬其明穎，確其廉勁。」據黃去疾《龜山先生年譜》，楊時政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離京，二月二日至南都，

見劉安世，二月九日別。三月四日至常州，寓居待次。三年，赴蕭山知縣（《咸淳毗陵志》卷一八：「政和元年，待次越州蕭山知縣，自京過毗陵，寓早科巷。……明年，赴蕭山任。」是楊時赴蕭山在政和二年。嘉靖《蕭山縣志》卷五也作二年）。四年奉祠，復入京師，八月自京師還餘杭。十一月，由餘杭徙居毗陵，十二月抵達。五年，又自毗陵單騎還鄉，十一月復還毗陵。楊時居毗陵凡十八年，然政和五年以前行踪不定，劉勉之與之相見當在政和末。由京師至毗陵復還崇安，實爲迂道專程拜訪。但《墓表》未言其詳，林之奇祭文也只稱「始學于譙」、「繼師于劉」，沒有提到楊時，恐此次拜訪僅止于一面而已。

總之，劉勉之的大學之行，決定了他的一生。從總體上講，他主要接受了二程的洛學，厭棄科舉，不求聞達，專注于修身養性。同時，他又接受了譙定的《易》學，劉安世的涑水之學，以及其他「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謝去場屋，劉勉之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三十年的隱居生活。

宣和元年，劉勉之二十九歲。

關於勉之娶親的時間，已無從考知。但根據其子女的情況，估計成親較晚。據《墓表》，勉之無子，其長女即朱熹夫人劉氏。劉氏凡生三男五女（黃榦《朱熹行狀》，最幼者生于乾道九年，四年後劉氏卒。（朱熹文集卷九三《女已志銘》）因此可以推測劉氏的生年大約與朱熹同時，即生于建炎末、紹興初。那麼，勉

之成親，或在宣和中，時已三十多歲了。夫人連氏，娘家富而無子，準備把全部家產交給勉之夫婦。勉之謝絕了，將這些財產分送給妻子的宗屬。這件事為劉勉之博得了聲譽，朱熹專門將其作為高行義舉，載入《墓表》。林之奇祭文中所贊揚的「萬金之產，視若埃塵」，即是指此。

劉勉之隱居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讀書論道。《墓表》說：「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于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巨細顯微皆有條理。」《屏山先生劉公墓表》：「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籍溪先生胡公行狀》：「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

而與之游，更相切磨，以就其學。」他們講論最多的，是《易經》。《劉氏傳忠錄》卷三載劉勉之挽劉子翬詩有「春寒古寺題詩日，夜永虛堂講《易》時」之句。《拙齋文集》卷九有林之奇《答劉先生》、《寄遺逸先生》二書，引錄了不少劉勉之論《易》論學的話語，是了解其學術思想的寶貴資料。《屏山集》也有不少提及讀《易》講《易》之處，如卷六《跋浩然子》：「吾黨有浩然子（潘殖），著書九篇，劉致中以示胡原仲，原仲轉以示余。」卷二三《入白水訪劉致中昆仲》：「暮投鵝峰宿，青燈耿柴門。相從二三子，交情久彌敦。談玄測象象，攬佩綬蘭蓀。」卷一九《原仲致中寄雪梅二詩再次前韻》：「清湖讀《易》日當午，烏石挂廬梅照晨。」值得注意的是，劉勉之同

胡憲、劉子翬一樣，也好禪學。《屏山集》卷一二《寄茶與二劉》：「大劉談天紫髯張，小劉逃禪清興長。」大劉指劉溫其，小劉即劉勉之。他們與宗杲弟子道謙等許多僧人都有來往，《東萊詩集》卷一四《送謙上人回建州》三首之二：「平生苦節胡元仲，老大多才劉致中。爲我殷勤問消息，十年堅坐想高風。」除相與講論外，劉勉之還經常向前來請教的學子傳經講道：「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林之奇、魏掞之、范念德、朱熹等許多名儒，都曾問學于勉之。當然，作爲一個隱士，劉勉之絕非「講學外無一雜言」。他的生活內容更多地是游山玩水、飲酒賦詩及琴棋書畫等。這